

特稿

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王缉思

2012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倡导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其界定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并且得到美国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回应。中美两国战略决策高层都意识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关键是要破解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魔咒”。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关系曾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严重冲突与对抗，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热战”，台湾海峡的对抗，政治意识形态的冷战，以及经济、文化、外交的相互隔绝。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虽然出现过若干次严重危机，但从未出现过长期激烈的战略对抗，发展基本上是平稳的。如果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特征，那么它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同时，近年来两国政府高层已经就中美应当而且必须避免冲突与对抗达成了共识，而且这种共识是40多年来历代中国领导人和历届美国政府用不同方式、不同语言反复表达的。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中美关系经过长达40多年的稳定发展，以及两国领导人关于避免对抗、发展合作的无数次宣言，仍然有不少国际舆论和两国国内有影响的人士，认为中美两大国最终会走上冲突和对抗之路？

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的原因何在，意义何在？本文还想回答的问题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标准是什么？其建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中美两国需要做出哪些各自的和共同的努力，才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一、中美对抗的魔咒为何日益逼近？

从战略研究的角度考虑，为何中美冲突与对抗仍然是一个魔咒、一个未来选项和可能性呢？在思辨意义上，存在着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两国领导层并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对方的战略保证，即中方不能相信美国关于“一个稳定、强大、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的说法代表了美国领导人的内心想法，而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遏制、西化、分化”；美方不能相信中国关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将美国排挤出亚太地区、不同美国争霸的说法是真心话，担心中国“韬光养晦”的思想反映的是在当下中美实力差距仍然巨大的条件下的一种策略算计，而不是长远的战略考虑，一旦中国羽毛丰满，就将挑战美国霸权。这就是所谓中美战略互疑。

第二，许多研究者和观察者不相信中美官方所表示的不相互冲突对抗的言论有足够的实际意义。他们可能认为，两国政府高层所表达的意愿即使是真的，也不一定能够掌控和改变两国关系走向对抗的长期趋势。有的中国人认为，由于美国的目标是竭力遏止中国崛起，中国只有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屈从于美国，才能避免对抗，而这是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反过来，也有美国人说，只有美国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听任中国政府在国际国内为所欲为，才能避免跟中国发生冲突，但这是违背美国立国之本与根本利益的。这种断定中美关系本质上是零和博弈的想法，在一部分社会精英中根深蒂固。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的根本差异，使两国关系渐行渐远。孔子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两国关系在表面上取决于两国政府如何处理双边和国际问题，其实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两个大国究竟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是合作维护和改革完善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是各自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利益去划分有形或无形的势力范围。用形象的语言来说，就是究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还是“同床异梦”，将世界一分为二？这种思路，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延伸。

上述三种思辨意义上的可能性，部分已经成为现实，至少成为两国部分政治精英的现实考虑。之所以出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议题，就是因为两国分别出现了战略互疑、零和博弈论、制度决定论等种种对中美能够避免冲突对抗的怀疑，而且这些怀疑是以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的推论为前提的。一个理性的推论，来自于国内凝聚力的需要。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思想家孟子就指出了“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道理。对当代中国来说，美国是最大最明显的“敌国外患”，在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中似无疑义。已故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说：“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

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¹由此可见,两国都有理由把对方视为“理想的敌国”,用以唤起国内的忧患意识,激发爱国主义,提高民族凝聚力,加强社会稳定。在某种意义上,同对方的冲突对抗,至少是局部的紧张关系,不仅有思想基础,而且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基础(比如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

如果把这三种思想因素和物质因素比喻为长期高悬于中美关系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那么现在这把剑掉下来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五方面的新因素,来说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紧迫性。

(一) 中美实力对比日趋接近,世界政治格局变化显著

今天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是因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实力天平迅速地向中国方面倾斜。2003年,中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1.4万亿和10.9万亿美元,中国GDP只有美国的12.5%左右。2013年,中国GDP超过9万亿美元,占美国当年16.79万亿美元GDP的55%左右。²中国国防开支迅猛增加,军事力量增强的趋势令人瞩目,而美国国防预算近年来被迫缩减。无论如何解读国内生产总值和军费数字,中美两国硬实力迅速接近,是不争之事实。许多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都是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或更早的时间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迅速扩大。在全球治理机制的结构性转型中,中国逐渐进入二十国集团(G20)等机制的权力中心。

与此同时,十几年以前的中国舆论普遍担心美国的战略扩张势头和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而今天的舆论导向是美国霸权风光不再,软硬实力同时受到削弱。在世界范围内,“金砖五国”各自力量的上升和相互合作成为国际政治的新特色。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包括欧洲主要国家和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整体实力和影响下降,许多非西方中等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其全球权力十几年以后将超过欧盟和日本。如果将政治世界分为“西方”和“非西方”,那么全球政治力量的天平也在向中国倾斜。美国在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位子上稳坐了100多年,在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上稳坐了20多年,其面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实力地位上升所形成的挑战,不可能不做出重大的战略和政策调整。中国在整个实力和世界地位上升

的新形势下,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也势在必行。

(二) 两国的政治分歧愈发明显,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

40多年来,一部分西方战略家和知识精英一直抱有一种幻想,即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最终将走向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政治,中产阶级的增加将导致“公民社会”的成长,市场经济的扩大将削弱国有企业的实力,等等。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这种幻想逐渐破灭。与此同时,美国人越来越担心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经验(“北京共识”)对美国式民主和美国倡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华盛顿共识”)构成挑战,从而从根本上冲击美国试图主导的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战略家亨利·基辛格揭露道:“新保守主义者及其他激进分子认为,民主体制是互信关系的前提;非民主社会在本质上是危险的,倾向于使用武力。……与非民主社会打交道,政权更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与中国相处不是一个战略问题,而是改变中国治理方式的问题。”¹

时下中国的一个主流观点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大变革大调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方把中国崛起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进行渗透。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否则最后必然会出大问题,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年苏联亡党亡国、东欧剧变,这几年来中东、北非国家动荡战乱、政权更迭,都足以让中国人深思。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和西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尤其是西方动辄对中国政治体制、经济形势、社会问题、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恶意“唱衰”、攻击污蔑、造谣抹黑,要敢于亮剑,不能客气,要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²这一主流观点,说明中国官方对美国的政治警惕性和反制措施正在增强。

(三) 经贸关系中的政治障碍增加,“压舱石”的作用减弱

一方面,近年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维持了高速增长,而且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相互投资的政治阻力也增加了。美方抱怨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市场很难进入,中国不断给国有企业输血、加强自主创新产业、限制采购外国技术产品,构成了对美国在华企业和产品的歧视;中国向多家外国企业发起了腐败调查、操纵价格指控和由官方媒体领头的抨击行动;美方还指控中国企业(主要是国企)在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下,通过网络窃取美国技术和商业机密,

1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2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2月24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初步核算,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亿元人民币,按照现行汇率核算已经超过9万亿美元。该统计公报全文可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stats.gov.cn/>。美国GDP的数字来源于商务部的国民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官方网站2014年3月27日发布的美国经济情况报告,参见 <https://www.bea.gov/newsreleases/national/gdp/gdpnewsrelease.htm>, 2014年4月16日登录。

1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08—509页。英文原文见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 520。

2 参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谈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在接见全军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代表时的重要指示》,《解放军报》社论,2013年11月10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要敢于亮剑》,《北京日报》评论员文章,2013年9月2日。

以弥补研发投入的不足。

中方则指出,美国国会和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给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和并购制造政治障碍。中国商界和舆论界对于中国继续持有巨额美国债券有许多非议,怀疑美元汇率下跌和货币供给的“定量宽松”等政策都是为了打压中国经济,阻碍人民币国际化。减持美国国债的呼声在中国舆论界上升。过去,中美经贸关系一贯被视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或“减压阀”,而今经贸摩擦向深度和广度拓展,而且同意意识形态斗争相互影响,其对两国关系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

(四)两国国内的若干不确定因素对双边关系造成影响,社会间的互不信任感加深

近年来,中美两国出现了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和突发事件。虽然其中大多数因素和事件不直接关联到中美关系,但对双方在对方国家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并通过舆论工具和社交媒体迅速传播。中国的水污染、空气污染严重,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问题频发,贪污腐败案件不断披露,社会不公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增多等等,在美国政治精英中经常引起议论。美国近年来因金融危机激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多起惊人的枪击案、爆炸案和国内恐怖活动,联邦政府因党派争端而停摆数周,等等,都给中国公众留下了深刻的不良印象。中国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2012年2月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事件损害了国家形象;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2013年5月到香港(后到俄罗斯)揭露美国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监听外国领导人的事件,进一步暴露了美国政治和外交的阴暗面。近年来的一些有权威的民意调查显示,中美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形象好感度下降,特别是在有关政治和外交的问题上,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很少。

(五)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态势越来越突出

第一届奥巴马政府强力推出“重返亚洲”战略,声称要向亚太地区“转身”,实现战略重点的“再平衡”,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惕。中国战略界人士普遍认为,美国这一战略重点转移主要是为了牵制中国力量的拓展。

中国日益重视同周边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关系,成为亚太地区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加强了在东海、南海地区的军事力量,强调对钓鱼岛、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主权,同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盟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凸显。许多中国观察家认为,美国是中国同邻国争端的“幕后推手”和“麻烦制造者”。

美国则担心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把美国排挤出亚洲,夺取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为了加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拓海外市场,掌握规则制定权,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这一制度安排的重点涉及资本

开放、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在中方表示可以考虑加入该计划后,美国官员声称只有在同日本、澳大利亚和部分东盟国家等结束有关谈判之后,才欢迎中国参加。¹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以日本、韩国等为依托的导弹防御系统已初步形成规模,美军的“空海一体战”概念也正在落实。这些举措都被认为是对中国国防力量迅速增强的反应。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竞争态势也在明显升温。

在上述五个新趋势中,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是带根本性的两大趋势,而其他几个因素基本上是这两大趋势的延伸。²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和发展道路问题,均非两国外交决策者能够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进行掌控的。双边关系是“表”,实力和发展道路是“里”,认清“表里关系”,才可能从战略思想和实际政策两个方面去破解中美对抗的魔咒。

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是带根本性的两大趋势。

二、中美发展道路与外交路线分析

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2013年的新著中所指出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³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决定了它如何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也决定性地影响了它的外交政策总方向。

(一)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外交路线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65年的外交史,可以看到区分明显的两大阶段和两个主题。前30年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后35年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前30年中国国际战略的“战争与革命”主线,是由那个时代的中国发展道路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边倒”政策,既确立了发展道路,也确立了外交路线。“文化大革命”让中国走了一段弯路,外交路线也出现了明显的偏差。

“战争与革命”并不意味着当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希望打仗,或者中国在国际上一直主张激进的革命。实际上,新中国迫切需要和平环境以发展经济。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110年的动乱时期相比,这30年的中国大体上还是和平、稳定、发展的。但在这一时期,战争阴云萦绕在新中国上空,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并据此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直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

1 参见何亚非:《中美的亚太共同利益》,《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11月4日,第42页。

2 从学术上说,从实力对比的角度去解释中美对抗的可能性,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视角,而认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会导致中美冲突的观点,是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视角。后者可以涵盖“民主和平论”等理论思想。

3 Richard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The Case for Putting America's House in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东论及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时,还说“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¹从1950年开始,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印边境、越南和中苏边境,中国对敌军事斗争持续发生。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20世纪70年代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都是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做的准备。“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是那一时期表述对外政策的一个基调;直到1977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还在声明“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²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之后的35年,外交路线的主题词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不是对前30年外交思想的全面否定,而是立足于新时期的国内中心任务确立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表述,一种期待,一项宣示。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关于所处的“时代”、国际格局、国际形势、战争可能性的总体判断,一直被视为确定党的中心任务的前提。其实,回顾60多年的中国政治史,与其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决定了国内中心任务,不如说国内中心任务的重新确定,反过来决定了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例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就大大降低了。实际上,从客观上看,如果将1982年同1977年相比,很难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按理说都是国际环境恶化、战争危险增加的征兆,更何况1979年发生了中国在中越边境的自卫反击战。但中国领导人反而在1982年做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当中国人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一个“科学判断”的时候,并不需要多少学术论证,因为这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决定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通过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从这点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和经济环境做出的判断是利还是不利,是乐观还是悲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论者对国内政治发展方向的期待如何,价值取向如何。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对于国际形势的刻画只用“十分复杂”几个字一带而过,就说明了国内外局势的这样一种相互关系。

中国的外交取向主要由国内政治所决定,并不意味着外交决策不能影响并塑造国际环境。新中国建立后头十几年所做出的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等重大决策,至今仍然影响着同相关国家的关系,仍然是国际环境中的重要因素。近十多年来,中国谨慎处理领土领海争端、两岸关系、朝核问题、中美经贸摩擦、国

际金融危机等涉及对外关系大局的问题,既以实力为后盾,又不动辄以武力手段或制裁措施相威胁,展现了外交的成熟,增加了国家的可信度,同时也有助于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外交,虽有前30年与后35年的明显分野,其连续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外交一直在为国内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主权统一这四大目标服务。维护国内政治稳定,要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主流意识形态,抵制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是60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原则;国家安全的概念从传统的领土安全、政治安全发展到今天的综合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但核心内容未变;从对苏联“一边倒”到今天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都包含着通过对外交往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目标;对台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到今天的“两岸共赢,和平统一”,表述有很大差别,但一以贯之的核心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完成统一大业。

展望未来,“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一定会持续,但是其内容与视角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和平”而言,过去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能否和平共处。在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基本稳定的今天,中国对和平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同局部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中国的海外利益相联系。就“发展”而言,过去中国的主要关注是摆脱贫困落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今后则会更加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衡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在保持很强连续性的同时,进一步为改革和发展的总任务服务。

(二) 美国的发展道路与外交路线

美国赢得冷战的国内进程是曲折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冷战初期(1946—1960年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和中期(1961—1980年肯尼迪至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忧患意识很强,国内政治问题和社会凝聚力经受了严重考验;而到了冷战后期(1981—1991年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治国的自信心逐渐增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上升。美国学者莱弗勒指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获得新的活力并向前发展,转折点是20世纪70年代,使得80年代的里根总统得以向世界夸耀资本主义的优越性。¹美国的国内变革是其赢得冷战的主要基础。²

在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基本稳定的今天,中国对和平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同局部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中国的海外利益相联系。

¹ 参见逢先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求是》,1994年第1期,第23页。

²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7年7月21日通过),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2/65368/4429440.html>, 2014年4月16日登录。

¹ [美] 梅尔文·莱弗勒:《美国赢得冷战的大战略》,费正清主编:《战略的魔力: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7页。

² 参见王绍忠:《国内变革:美国大战略及其赢得冷战的基础与动力》,费正清、费正清主编:《缔造霸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

冷战的结束,增强了美国对自身发展道路的信心,同时也使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大大膨胀起来。回顾冷战后美国大战略发展变化的轨迹,可以明确看到其连续性和阶段性。自从苏联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以后,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自己在世界上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领导地位”,即霸权。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来说,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利益是保障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本国价值观。从理论上来说,这三者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

全球化时代的美国经济繁荣,完全不能离开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稳定。维护美元霸权下的金融秩序,维护公平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以及保证海外资源的获取,是冷战后美国大战略中经济部分的核心目标。

冷战刚刚结束,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就盯住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扩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9·11”事件使反恐成为布什政府的中心任务,而奥巴马政府又突出了“核恐怖主义”的威胁。通过“9·11”及其他一些恐怖事件,“恐怖主义”在美国人眼中同“基地”组织等伊斯兰激进势力联系起来;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同基督教新教息息相关,而基督教同伊斯兰教的所谓“文明冲突”同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挂起钩来。这样,对美国安全利益的主要威胁来自该地区的核扩散、恐怖主义组织以及力图掌握核技术的国家,就顺理成章了。至于朝鲜,冷战后美国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其核武器计划和同伊斯兰国家的核合作。

保障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是几乎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靠价值观或曰意识形态为本而立国、而维持内部凝聚力的国家。丢掉了民主、人权、法治、宗教信仰自由这些意识形态信条,美国就不成其为美国,就会分崩离析。从克林顿、布什到奥巴马,都坚持以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制度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自身利益,以及它同其他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但是,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从来没有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来界定敌友。

冷战后的美国从未把任何一个大国视为敌国或主要安全威胁,而是企图通过巩固原有联盟、将中俄印等大国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等方式,维持其唯一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美国大战略方向不会发生变化。

冷战后美国大战略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在三个总统执政时期的不同战略侧重点和外交方式。克林顿政府的侧重点是维护全球化时代美国的经济利益,较为突出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构建,其国家安全战略明显是“使命导向型”的,同时仰仗那一时期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实行战略扩张。“布什主义”的战略侧重点是国家安全,特别是反恐和国土安全,在国际机制中更多地采用单边主义的做法。布什政府的安全战略是“威胁导向型”的,明确将最大威胁指向伊斯兰激进势力。

它在安全战略方面是扩张型的,但经济战略相对保守。

奥巴马政府继承了克林顿时期“经济优先”、重视国际机制建设和多边外交等特点,其安全战略也是“使命导向型”的;所不同的是,经过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政治外交创伤和2008年后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实力地位同克林顿时期相比明显下降,国内外经济与社会环境挑战增多。

2008年美国大选之前,四分之三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整个国家“正走在错误的方向上”。¹奥巴马执政之后,特别是在他的第二任期,美国的“内向”趋势相当明显。财政平衡、经济复苏、增加就业、政治极化、医疗改革、枪支管制、打击贩毒、移民政策,都是奥巴马政府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因此在对外关系方面不能不采取战略守势,医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造成的创伤,在国际军事干涉等问题上慎重地权衡利弊。基于信息化世界的新特点,奥巴马政府摒弃了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的安全战略,强调“巧实力”、公共外交和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战略的内涵大大扩充了。

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调整与纠偏,从根本上来说,是试图纠正其发展道路上的偏差。理查德·哈斯指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中国崛起、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伊朗核计划、中东动荡、朝鲜的莽撞,都对美国构成严重挑战。哈斯说,美国实力的许多基础正在受到侵蚀,如不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水平、调整过时的移民政策、清理债务,美国就无法保障国家安全,促进海外利益,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强全球影响力。全球政治权力正在分散下移,今日世界对美国来说是相对宽松的,不存在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大国对抗,所以正是美国休养生息、苦练内功的时代。²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主流战略家的观点。

通过对中美两国发展道路与外交路线的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出两国发展道路虽然不同,但都把国内任务放在首位,都认为今天自己在“走正路”——中国走改革开放、发展稳定之路,美国走经济复苏、财政平衡、技术创新的变革之路。这两条道路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加之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应可实现双边关系的平稳发展。如果两国在发展道路上犯了颠覆性错误,不但本国的利益会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会导致两国在国际政治中“分道扬镳”,使国际社会出现分裂。如果两国坚持走各自认定的正确发展道路,那就能够避免对抗,实现“殊途同归”。这里的“同归”,并不是指两国的发展道路日益相似、接近,而是各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两相发展且相得益彰。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美中之间不应该是零和关系,两者之间应该建

1 Richard C. Cook,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A Revolution or a Bust," *Global Research*, March 15, 2008, <http://www.globalresearch.ca/the-2008-presidential-election-a-revolution-or-a-bust>.

2 Richard Haass,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The Case for Putting America's House in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立的与其说是伙伴关系，不如说是“共同进化”(co-evolution)的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¹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殊途同归”。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何谓“新型大国关系”？尽管中美双方并未使用相同的概念，对其理解和期待也不尽相同，但双方业已存在的基本共识在于：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按照中方的说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按照美方的说法，它是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的打破，是以“新答案”解决“老问题”。

两国对新型关系的不同期盼，无论是从字面上理解，还是从实际情况中分析，都反映了各自核心关注点的不同。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2010年发表了一篇引起很大国际反响的文章，其中说到：“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个人理解，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²2011年中国发表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把“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纳入坚定维护的国家核心利益范畴之中。³按照我们的理解，中方在对美关系中的一贯强调的“相互尊重”原则，首先是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即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及政治秩序。中美关系中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主要敏感问题，包括台湾、西藏、新疆、人权等，都可以联系到“国体和政体”上去。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政策，也主要是从维护国内政治的长治久安出发的，对美政策尤其如此。

反观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界定和期待，都关系到它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它所极力维护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谈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美方总是表示，希望中方一是在朝核、伊朗核等美方视为重大利益的国际安全问题

上同美方合作，二是在金融稳定（其中关键的是美元的霸权地位）、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照顾美方的关切。对于美国来说，它在自身的国体、政体、政治稳定、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等问题上，都没有感受到中国的威胁。美国人担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以其正在形成的巨大实力和世界影响，造成对美国地位及其倡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这就是美国把主要关切聚焦到“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避免对抗”（即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上的原因。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关键，是理解两国对未来关系的不同思路和期待，找到利益汇合点，避免利益碰撞点。美国尊重并从主观上不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内秩序，才能说服中国尊重并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和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反之亦然。

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从20世纪90年代的“建立新秩序”，逐渐过渡到当前的“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显示出中国对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和信心。事实上，中方已经反复向美方说明了对美国世界地位和现存国际秩序的看法，并通过实际行动建设性地参与了全球治理与新形势下国际规则的制订。但是美方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对中方重大关切的的不理解，从未明确说明对中国政治制度、国内秩序、发展道路的尊重，而只是要求中方在美方关切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配合行动。

应当看到，美方关切的问题，多数是一些变动的目标(moving targets)。美国在若干年前关切的是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问题、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问题、本·拉登和“基地”组织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解决或缓解了之后，又集中到朝核、伊朗核、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如果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同这些无穷尽的变动目标绑在一起，是没有出路的。

中美两国都有一些战略家，把避免两国的冲突对抗理解为避免战争。事实上，在当今国际环境和两国国内环境下，双方发生严重军事冲突并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虽不能完全排除，至少可以说是微小的。为把这种危险减小到最低限度，双方应当加强军事交流，建立可靠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危机管控机制。

更加令人担心的是“新型冲突”与“新型对抗”的危险。“新型冲突”包括网络战、太空战、货币战、贸易战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无硝烟战争”；“新型对抗”，指的是有形或无形的针对对方的国际联盟、反联盟和“势力范围”，耗费巨大的军备竞赛（包括建设以对方为主要打击目标的“网军”），等等。这类恶性竞争已经发生了，必须通过战略对话和有效机制加以约束。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关键，是理解两国对未来关系的不同思路和期待，找到利益汇合点，避免利益碰撞点。

1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页。基辛格在注释中提到，“共同进化”(co-evolution)的概念是乔舒亚·库珀·拉莫采用于中美关系的。有的中国论者用“共同演进”等译法，似未注意到其原本的生物学概念。英文原文见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 526.

2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2010年12月7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12-07/2704984.shtml>，2014年4月16日登录。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11年9月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5598625.html>，2014年4月16日登录。

4 详见王缉思：《东西南北，中国居“中”——一种战略大棋局思考》，《世界知识》，2013年第21期，第21页。

在此,我们愿意大胆设想一下中美建成新型大国关系的时间和标志。目前,中共十八大产生的领导集体和美国奥巴马民主党政府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10年以后的2023年,中国将产生新一代的领导集体,从现在算起美国将换过两任总统。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人,将是那时两国领导人的主力。在他们身上,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烙印基本消失,代之以信息化时代的全球眼光。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将不相上下,而且双方都适应了这样一种权力结构。中美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进一步扩大,利益汇合点增加。尽管政治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相差甚大,但两国面临的全球挑战相似,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观点日趋接近。双方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危机预防与管控机制,没有结成明显针对对方的国际联盟,也没有在亚太地区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各大国力量相对平衡,在金融、环保、贸易、能源等领域,出现了更加完善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这一局面,将标志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成。

专题:聚焦日本与中日关系

令人担忧的安倍晋三政权

王新生

内容提要:安倍晋三第二次当选首相后大力实施“安倍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出现股市上涨、日元贬值、经济恢复增长的局面,自民党因此获得2013年参议院选举的胜利,但安倍首相的最大目标是推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即修改宪法、实现集体自卫权、增强军事实力等,成为名副其实的“普通国家”乃至军事大国化,并为此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尽管如此,日本经济能否顺利恢复增长、老龄化少子化人口结构下的国内市场萎缩、发展军事实力尚缺乏民意支持以及美国因素的影响,均对其目标的实现投下阴影。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 修改宪法 集体自卫权 军事大国化

由于“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安倍内阁支持率持续上升,且取得2013年参议院选举的胜利。但由于强行通过《秘密保护法》,安倍政权也导致民众的抗议,甚至美国也对其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失望”。另一方面,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与政治领域的新国家主义改革之间的相互矛盾增加了改革的难度,老龄化、少子化人口结构拖累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与发展,特别是其新民族主义外交政策阻碍了与近邻国家经贸合作的进一步顺利发展,也许“积极和平主义”式的新型穷兵黩武政策成为安倍政权重振日本的主要策略?

一、搞活经济,稳定政权

自从1992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发展一直处在低迷状态,甚至有

王新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